

ZHONGXIAOQIYE YU JISHUCHUANGXIN
XIHU GUOJI ZHONGXIAOQIYE YANTAOHUI LUNWENJI

中小企业与技术创新

——西湖国际中小企业研讨会论文集

浙江工业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小企业与技术创新

——西湖国际中小企业研讨会论文集

浙江工业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稳定、快速的发展。本论文集收集了 43 篇学术论文(中文论文 36 篇,英文论文 7 篇),涉及国内外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组织管理、技术创新、国际经济合作等,论述充分,资料翔实,极具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中小企业管理者及相关管理人员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小企业与技术创新:西湖国际中小企业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工业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ISBN 7-03-012667-X

I. 中… II. 浙… III. 中小企业-技术革新-界-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F27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6488 号

责任编辑:童安齐/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刘士平/封面设计:耕者设计工作室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年2月第 一 版 开本:B5 (720×1000)

2004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2

印数:1—2 000 字数:427 000

定价: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mall & Medium Business

—Proceedings of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ll & Medium Business
B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mall & Medium Business Institute

《中小企业与技术创新》编委会

主 编 吴添祖

执行主编 冯 勤

编 委 吴添祖 池仁勇 冯 勤 欧阳仲健
纪松涛

MA639/05

前 言

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稳定、快速的发展。这几年,我国中小企业在国务院及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2003年1月《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中小企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年一届的西湖国际中小企业研讨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和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共同主办,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所和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承办。自从1999年第一届以来,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四届。研讨会得到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他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对中小企业发展进行了探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推动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交流合作。通过研讨会,我们共同学习和借鉴了国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与做法,并探讨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途径和方法。

为了使更多的人分享会议的成果,主办方决定从会议发表的论文中筛选一批,结集出版。本书有43篇学术论文,其中,中文论文36篇,英文论文7篇,涉及国内外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组织管理、技术创新、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本书论文作者观点新颖、论述充分、资料翔实、极具参考价值。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我国中小企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浙江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吴添祖

2003年10月15日 杭州

目 录

第一部分

简论小企业集群与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	仇保兴(1)
大力实施三大创新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钱信浩(10)
加强引导和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吴桂英(15)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浅析	郑明治 严国林(19)
加入 WTO 后民企二次创业的方略选择	高天乐(28)
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政策扶持	肖运鸿(32)
浙江中小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对策	谭燮良(38)
企业自觉环境管理环境评审系统构建	宣晓冬 施放 焦长勇(43)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分析	池仁勇(49)
风险投资交易契约中的金融工具创新研究	汪继华 汪少华(60)
解决小企业资金困难的途径	徐礼莱(68)
中小企业国际化中的环境管理	姚利民(77)
中小企业如何革新经营创造利润	邱明正(84)
技术创新与农村的可持续性发展	马 驰 胡应得(90)
引进来 走出去,促使我省中小企业更快成长	戴均奎(98)
企业创新文化——贯穿于员工、组织及外部环境之间的高层文化	陈 劲(102)
我国中小企业集约化经营的对策研究	欧阳仲健 卜庆军(109)
日本中小企业的构造改革支援政策及对我国借鉴	王卫华 池仁勇(116)
中小民营企业成长与管理模式选择	蒋建华(124)
浙江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调查情况和建议	杨植源 李 旻 阮云波(130)
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特点与融资策略	吕晓青(138)
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应收账款的风险防范	胡鸿(142)
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决定因素分析	王飞线(148)
突破型产品创新与企业规模	余 浩(155)
传化集团追求管理理念创新与文化建设的体会	徐冠巨(166)
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研究模型初探	虞晓芬 周刚强(172)
浙江民营科技型企业状况分析	陈铁军(180)

澳门政府对中小企业支援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望	周经柱 (192)
发展电子商务提升中小企业国际竞争力	陈畴镛 王晓耘 (198)
温州民营企业的新发展——从“温州模式”到“新温州模式”	谢健 (203)
新型工业化与绿色技术创新	龚建立 吕海萍 (210)
美国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	林环 (216)
关于发展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业的思考	纪松涛 冯勤 (221)
中小企业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施放 蒋建华 郑才林 (227)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研究	冯勤 (233)
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概念的界定研究	俞世卯 池仁勇 (243)

第二部分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SMALL BUSINESSES IN ZHEJIANG, CHINA	Wu Tianzu Zou Gang (250)
A HOLISTIC VIEW OF EFFECTIVE CORPORATE LEADERSHIP FOR SMB	Raymond Chan (258)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AIWAN	Tzongshian Yu (268)
SMBs IN SRI LANKA - STATU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Nirmala M. Pieris (280)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SME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David Smallbone (300)
SMEs IN THE NEW CENTURY: CHALLENGES, PROSPECTS & LESSONS	Alok Ray (310)
IN SEARCH OF CORPORATE COMPETITIVENESS: LESSONS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udrey Tsui Heung Heung (329)

第一部分

简论小企业集群与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

仇保兴*

小企业集群可定义为一群自主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企业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建立起来的组织,它广泛存在于我国沿海各省(包括台湾省)、日本、美国及意大利等国家。在这种组织内,小企业之间广泛地进行着物质、信息、产品链、工艺技术、管理经验及商业信用等方面的交换。因此集群内的每个小企业都可以获得集群外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工业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首先分析我国现阶段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然后对工业产业组织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并比较和借鉴我国台湾省和韩国的经验教训,最后分析了大中小企业的合作及集群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途径,得出优化产业结构的基本结论。

一、现阶段我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体制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阶段我们要完成的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任务同 80 年代以前相比,有着三个方面的区别。

1. 调整的对象已经从产业间的比例调整转到深层的产业结构调整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为缓解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结构失衡,我国加强了对电力、交通、通信、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等“瓶颈”行业的投资力度和体制改革力度,使这几个行业在 1993~1995 年间占全国工业比重的增长幅度为最高,基本上已经缓解了基础行业与加工行业比率失调的问题,从而使调整的重点转向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实现各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

* 经济学博士。原杭州市市长,现任中国建设部副部长。

2. 调整的措施,从主要依靠国家的政策行为转变为主要依靠企业的策略行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形成,国家计划的资源配置功能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作用已大大下降。各个产业或工业部门各行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只能主要依靠各个企业自主地进行经营策略调整来实现。

3. 调整的目标,已经从宏观平衡转向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产业结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补短”(即弥补产业短线,克服供应短缺)为基准目标的。因而,产业调整具有明显的“宏观平衡导向”性质。到 80 年代末期,工业部门 600 多个主要行业已经基本消除了短缺所致的卖方市场。再加上我国工业能力的迅速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1978 年的 206 亿美元迅速上升到 1997 年的 3251 亿美元,已相当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6%,出口贸易总额在各国和地区的排名已由第 32 位提升到第 10 位。时至今日,我国各行业的企业都必须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空间,其实质,是要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寻求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当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转向企业自身时,两个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将产业结构的调整仅仅看做是产品结构的调整,从而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解决产品同构和质量问题上,从而完全忽视了引发这类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产业组织的优劣。另一常见的错误,是将产业集中度作为衡量结构优化的主要目标,并导致将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在大企业集团的规模扩张上。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步入“韩式”的歧途。在此阶段,认真分析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工业产业组织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升级与产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广义上来看,产业组织是指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指生产要素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动态组合方式、组合活动,组合方式表现为生产要素如何组合,采取什么样的组合形式;组合活动则表现为实施某种组合方式的一系列活动。产业组织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集中地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 产业组织是产业结构的微观结构

如果说产业结构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各个部门或产业之间的配置的话,那么,产业组织则是产业内部各企业或企业内各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生产要素在产业内部的配置。因此,它是一种“微观产业结构”。没有产业组织作为微观上的载体,产业结构对生产要素的“宏观”上的配置就无法实现。我们可将产业

组织主要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独占型模式,即纯层级组织;第二类为竞争型模式,即纯市场组织;第三类为中间性体制组织,其中又可分为寡占型的企业集团模式和小企业集群。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在今天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越来越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从交易费用角度看,企业内部交易费用过高时,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外化;反之,当市场交易费用过高而企业更有效率时,可以通过企业组织来“内化”。如果企业和市场的交易费用都相对高时(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小企业集群和其他的中间性体制组织就应运而生了。

2. 不同的产业结构要求有不同的产业组织与之对应

不同国家、不同质的文化沉淀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产业结构会有很大的差别,既有各个产业的规模不同、比例关系的不同,还有一定发展水平的产业数量多少的不同。这些不同点,规定了在不同的产业结构中,产业规模、产业比例及产业数量方面的差异;与此相适应,不同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组织,也会有许多不同之处。一般来说,发达的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要求有较为完善的(即在较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仍保持较低交易成本)的产业组织与之相对应;而不发达的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则对产业组织的要求程度相应降低。小企业集群作为中间性体制组织的主要表达形式并有着广泛的适应性,正是由于它是一种能对应于外部交易条件和市场环境变化的自我适应调节的经济系统,它的主要成分和组织结构可以根据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灵活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重新组合和自我调整。也就是说,这种产业组织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生存能力。

3. 产业组织合理化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前提

对于正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三方面转变的我国经济来说,现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应从产业组织的优化入手。单纯的产业比例关系的调整,只不过是所谓“宏观产业结构”的改变,而“微观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靠这样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很难实现,调整后的产业结构只不过是一种“虚优化的表象”而已。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是宏观的和微观的、表层的和深层的全面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伴随着产业组织的再造;优化产业结构必须以合理化的产业组织为前提。

4. 产业组织是实现产业政策调节目标的微观环境基础

因为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产业政策往往是调整的手段,现行的产业结构是调整的对象,产业升级是调整的目标。而联系这些手段、对象和目标的载体就是产业组织。调整的主体是国家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这只是对发布产业政策而言的,但真正的实现调整的主体则是企业。企业包括它的有机的集合组织——小企业集群对产业政策作出反应。这种反应直接表现为生产要素在企业之间乃至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与企业之间信息和物质流通网络的自适应调整,从而使产业结构

向着产业政策诱导的方向变化(如果产业政策有效的话)。这一调整——反应过程就成为产业结构政策的作用机制。同时,相对于纯层级组织和纯市场组织来说,小企业集群之类的中间性体制组织的存在更具普遍性。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实际上,产业政策是通过诸如小企业集群之类的中间性体制组织的自适应调整来使产业结构得到调整的。缺少产业组织的“受激反应”,产业政策作用机制就将被破坏,通过产业政策诱导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因此,产业组织是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必不可少的微观环境基础。

三、我国台湾省和韩国经验的比较分析与借鉴

在我国,指导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文章的一个常见错误,在于过度依赖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片面认定我国产业组织的问题在于产业集中度过低,完全忽视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普遍的产业组织的存在,仅将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在另一种中间性体制组织的表达形式——大企业集团上。或者将企业间的兼并、整合作为产业组织的调整的惟一方式。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产业政策的结果,已被实践证明是极其有害的,一对可比较的典型实例就是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产业组织结构及其实际效果。

我国台湾省和韩国经济有很多类似之处。例如,两者的资源占有情况相近,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另一方面,却都拥有教育程度较高、素质较好的劳动力资源。狭小的内部市场迫使我国台湾省和韩国都大力倡导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两地经济起飞也均以成功的土地改革为起点,时间上亦差不多,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都经历了年平均接近 10% 的高速增长。1990 年台湾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 7954 美元,韩国为 5562 美元,被称之为亚洲四小虎中的两只。有意义的是两地经济都有着同样的社会人文环境,受传统东方儒教的影响甚深,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条件(包括接受美援)也几乎完全一样。但除了这些相似之处以外,两地经济发展的重大差别就在于产业组织结构,我国台湾省是以中小企业和与这些企业相伴生的小企业集群的组织结构为主,而韩国则是大公司集团的天下(参见下表)。

中小企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1981)

国别	企业家数	所占比重/%	雇员人数	所占比重/%	产值 ²⁾	所占比重/%	出口 ³⁾	所占比重/%
中国 台湾省 ¹⁾	90580	98.9	1362551	62.0	9418	53.1	10559	71.8
韩国	32384	96.9	1044945	52.1	5362	34.8	4823	22.3

1) 台湾省雇员为 1997 年度数字;

2) 产值单位分别为百万新台币和 10 亿韩国元;

3) 出口单位为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台湾产业组织论》,122~128 页;《韩国产业发展制度与政策》,第 354~355 页。

韩国前十名最大的企业集团的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5%；而台湾省 1980 年最大八家企业集团的年销售额仅占当年我国台湾省国民生产总值的 15.3%。韩国最大的企业“现代集团”1981 年的销售额为 100 亿美元，同期台湾省十家最大民营企业总收入为 35 亿美元，仅为“现代集团”一家的 1/3。1976 年韩国企业平均雇员人数是 68.8 人，而台湾省为 34.6 人。就平均规模而论，韩国工业的集中程度远远高于台湾省。

这两地的经济由于产业组织结构不同，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也大相径庭。始发于 1997 年 2 月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 1998 年 3 月份韩国的货币与前一年同期相比贬值了 50%，而台币仅下跌了 15%。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1998 年的经济增长转变为明显的负增长，而台湾省的增长速度只略低于 1997 年。韩国因国内经济急剧恶化，据 1998 年 2 月份的统计，韩国居前 30 位的大型企业集团共有 8 家宣布破产，而不得不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而同期台湾省却由于占有外汇储备全球第二位的优势而频频进行所谓的“银弹外交”，企图以危机期间的“经援”来谋求其政治地位 and 市场份额。

比较台湾省与韩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奉行不同的产业政策，是造成这两种不同产业结构的主因。韩国政府给了大企业集团的很多优惠政策，政府与各私人大财团关系非常密切，历任韩国政权的高级官员大多数都直接参与过大集团的贷款活动，金融机构按政府的指示贷款给相关的大企业，企业又沦为某党派的地下金库。虽然，这种扶植大企业的政策导致韩国在需要大量投资的产业部门例如汽车、造船、化工、钢铁和重型机械方面的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张，并具有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但由于获取银行贷款过分方便而导致各大企业集团负债比率一直居高不下，并盲目进行多元化经营，在居前 30 位的大企业中，负债率超过 500% 的就有 10 家之多。韩国 30 家最大的集团资产和负债加在一起，占了全国财富的 1/3 以上，当金融危机来临之际，银行为保自身安全，再无力继续向大集团“输血”，韩国大企业集团的破产浪潮就在所难免了。而台湾当局在对待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上，则采取较为体现机会均等的方针。对企业的干预较少，基本上执行的是自由经济政策，同时在产业政策方面对中小企业面临困难时积极给予支持，再加上台湾当局与以本省籍为主的大财阀缺乏密切的利益联系，导致台湾当局未采取对大企业优先扶植的政策。

此外，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种种因素，台湾省的中小企业已经在组织结构上构成了各种类型的小企业集群，从而形成了涵盖各种产业领域的完整而又细密的分工网络，一个原本需要大工厂生产的很复杂的产品，可以依靠小企业集群内的协作体系分摊给许多专业化生产的小企业来完成。这种从单个企业看上去很“弱”，而整体上却非常“坚韧”的小企业集群的产业组织结构，使台湾省的工业产业无论是在过去几次国际性石油危机，还是 1997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居然能够较安

全度过,所付出的代价比韩国等以大企业集团为主的产业组织结构的国家或地区要小得多。

四、大中小企业的合作及集群化 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途径

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上的主要缺陷不仅仅在于企业规模偏小,更重要的是缺乏企业间的分工和协作所导致竞争的无序化。这种缺陷又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可以将小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相互竞争型。这里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集镇企业无论大小都有主管部门或地区的行政力量为其撑腰,造成画地为牢、分割市场式的恶性竞争。另一种是在市场经济较完善的地区(如我国台湾和大陆沿海地区)接近“纯市场型”的小企业集群与大中企业展开平等的竞争,并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

二是互不相干型。这在现代市场经济情况下,几乎是极为稀少,主要是应用特殊工艺、特殊稀有原料的小企业或手工工艺品作坊类等等。

三是分工合作型。我国学者张仁寿将这种分工合作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他认为,从广义上来说,小企业在采购、销售、生产、技术开发、融资等各方面只要同大中型企业发生联系,即可称为两者产生了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往往是暂时性、不稳定的,但又是小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的合作中最常见、最普遍的。从狭义上说,小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的合作体现在网络关系上,即双方通过资本联系或有关协议、承诺以及人际关系而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固持久的分工协作关系,或者是大中型企业与某一小企业集群发生联系。这两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现代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它正逐步成为小企业与大企业合作协同的主流。

这种合作关系最典型的结构为“中卫式”(又称椎型集群)。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种“中卫式”结构的大中小企业合作形式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和作用。

1. 发挥小企业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

因为,“中卫式”合作结构不仅使大中型企业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顺利地承担了产业升级的主力军角色。而且以其内含的交易、组织关系使大企业牵引、提携小企业进入了高层次的生产空间,使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向与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保持了较高的“相关度”,从而使它们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与此同时,“中卫式”结构使产业组织中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保持有序竞争状态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例如,在“中卫式”结构中,中心企业与卫星企业相互间的交易、组织活动基本上形成了正向因果关系的价值链,实现了企业间关系的高度

合作与协同。以日本为例,这种结构使该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和减轻了“二元经济结构”曾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深重负荷和震荡,如因大量的小企业难以与产业升级挂钩而发生的失业、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宏观调控困难等问题。所以,“中卫式”结构的小企业集群,能在社会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协调产业组织内部关系,使小企业成为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中的一支生力军。

2. 形成不同规模企业间独特的技术传递链

在市场交易的基础上,“中卫式”企业集群中的网络组织行为,使大中企业主动把质量管理、新产品生产方法、生产工艺流程设计、设备改良、新技术情报、新产品开发技术等传递到了卫星状分布的小企业手中。反之亦然,卫星企业用自己高度专业化或特有的技术为中心企业生产部件时,也等于把自己的技术并入了中心企业的生产系列之内。所以小企业集群在协调产业组织内部关系的同时,塑造了在不同产权归属的企业间有目的地传递技术的超市场行为。当然这最终也是以交易为目的的。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先进技术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迅速扩散,以及提高小企业在产业升级中的优势与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与我国台湾省中小企业技术进步较快,又能使大企业享受本企业之外的专业技术。这种小企业集群在大中小企业间发挥的协同功能,对打破市场经济中技术扩散的产权屏障,是有一定作用的。

3. 塑造适应“二重结构”的分层竞争结构

一方面,“中卫式”结构所体现的垂直分工,大体上界定了大中型企业与小企业不同层次的竞争空间,避免了全面的过度竞争。例如,在日本和我国台湾省,制造业小企业间的竞争,主要围绕着争取大企业的定货而集中在产品质量、交货时间和价格三个方面进行。另一方面,由于大中企业按最终产品的竞争价格所要求的成本与卫星企业制定承包单价,这就在避免越界竞争的同时又把高层次竞争的压力适度地传递到了众多的小企业,促使它们按照高标准劳力的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等等。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卫式”结构或下承包制,是使小企业在适当的度上与高层次竞争发生联系,以充实产业升级动力的产业组织安排。

4. 创造四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是委托制造优势。以汽车工业为例,日本的丰田等代表性大企业由于与众多的中小企业集群共同构成“中卫式”结构,所以其零部件外购率平均在70%~80%之间,其中自制锻件在日本平均只占15%左右,而在我国的机械工业企业这一比率高达90%以上,铸件也达80%以上。产生这种外购率差异的原因,除了我国固有体制问题之外,也与企业扩张的方式有关。在我国,以及韩国和欧洲一些国家,

其大企业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常采用设立分公司或购买兼并现有企业将其置于总公司的直接管理之下的方式,故其总公司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结果就难以避免组织结构的僵化臃肿,产生大企业病。而“中卫式”结构的产业组织,则将大部分的零部件委托外部中小企业去制造,创造了所谓的 OEM 生产方式。这种产业组织不仅大大提高了专业化程度(如日、美等国的汽车生产专业化程度都达到 95% 左右,而我国只有 30%),而且也有效地防止了大企业病,使核心企业能迅速地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保持并强化了自己的竞争力。

其次是长期交易的优势。当大企业一旦与小企业集群结成“中卫式”结构组织时,企业之间就具有了相互关系密切的信任承诺关系,尽管这时的交易关系不需以正式的契约进行约束,但在实际上,如不发生重大变故,彼此之间的交易将长期持续,并保持了适度的替换和竞争压力。而且核心企业还会对相关的小企业进行技术指导、设备改进、资金援助等等帮助,从而形成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亲密关系,甚至发扬团队精神,共同对外展开竞争。

再次是专属优势。在日本等国的“中卫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专属于一个中心企业的比率达 34.9%,而专属于两个中心企业的比率则为 16.1%,两者合计占全部分包小企业总数的 51%。在汽车工业中这一比例更高。日本汽车工业的二级分包企业基本上都是为一级分包企业加工作业,故其设备专用性很高,即只为中心企业(或上级分包企业)加工生产零部件。与此不同的是,欧美等国及我国台湾省的分包企业因专属性甚低,其分工状态是为众多大企业进行适量、多品种加工以及大量生产“标准化”的零部件。而日本的分包企业则是为了惟一或少数中心企业进行大量专用零部件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经济效率和灵活性,是有明显差异的。只有在日本及我国台湾省、意大利部分地区,由于小企业的专属性高,故可能彻底利用生产的专业化和外部化,令分包企业承担子系统的组装加工,以谋求大幅度降低成本,但也使卫星企业牺牲了对市场变化的适应弹性。

最后是管理成本低的优势。由于在专属性很高的小企业集群中,对中心企业而言,前一、二级的分包企业也进行组装(子系统总装,或称为次总装)作业,故中心企业并不需要一切从零部件开始一直组装成最终消费品,中心企业只需直接管理控制一级分包企业,就可以间接控制二级分包企业及其以下全部系列的小企业了。与此不同的是,在我国及欧洲某些国家,不仅大企业的外购率比日本和台湾省要低,而且其零部件供应商呈现无序散乱的关系,故一方面大企业需要与所需要的一切零部件企业直接交易,另一方面对下包企业的调控力较弱。以汽车工业为例,日本丰田集团为核心的“中卫式”企业集群,由 3 万多个大中小企业组成,但直接与丰田总公司发生交易关系的分包企业只有 168 个。而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和德国奔驰公司直接交易的零部件企业分别高达 1500 个和 18 000 个。通用汽车公司中专门负责与零部件企业交易的职员达 6000 人,而丰田仅为 337 人。可见,“中卫式”小

企业集群由于存在直接交易的分包企业数量小的特点,因而能大大降低了大企业的管理成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要充分认识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质特点,决不能以超经济行为的产业政策来包办应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品结构调整。

(2) 要充分认识产业组织结构在一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特殊作用。简言之,我国广大农村以小企业集群为主的产业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作用载体。

(3) 要充分认识“抓大与扶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那种认为只要把 1000 家大企业集团抓好,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就已得到调整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没有星罗棋布的小企业集群,大企业集团必然会发展成为“大而全”的“泥足巨人”。由于我国执行了 40 余年的计划经济,摆脱“大企业集团”的诱惑,防止重蹈韩国的覆辙,更是我国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政策选择中的当务之急。

(4) 要充分认识小企业集群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特殊地位。那种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太多太小,企业规模不符经济效益,构成资源浪费,且会影响产业升级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造成我国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强与中小企业的数量并无必然联系。主要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我国中小企业在工业体系中的定位不明确,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化程度过低,集群化不足。另一方面,大企业与小企业也缺乏有机组合,大而全几乎已成为普遍的病症。所以,从对症下药的角度来看,应立足于现实,注重于小企业集群的优化。借助于集群内部细密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可以使每一小企业成为高新技术和设备的拥有者,或是大中企业的协同者,从而能以较低的成本来获得产业的整体升级。因为,如果没有小企业的集群化,不仅没有小企业自身的外部规模经济,也会削弱大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性。

参 考 文 献

- 仇保兴. 1999. 小企业集群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58
李京文. 1998.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选择.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33
牛文文. 我国改革开放硕果累累. 1998 年 9 月 23 日《经济日报》